

## 「城市·記憶·想像」專題引言

楊 揚\*

「城市·記憶·想像」專題，著眼的對象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在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一般的研究者最看重的對象是作家作品。這種積習，由來已久，以至中國大陸新近出版的數十種文學史著作，大都以此為藍本。對這種中國式的文學史研究模式的得失評判，需要深刻反省，這一工作可以留待以後的欄目來專題討論。本專題的側重點，是希望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領域另起爐灶，尋找一些新的增長點和可能的學術空間。

在大一統的中國文學史版圖上，地域因素是造就文學差異最堅固的天然屏障，這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常常被一些文論家們表述為「南北文學不同論」。但時間推移至二十世紀，基於地緣因素而創設的「南北文學不同論」被賦予了新的時空內容。如果從現代性來考慮，文學史研究中京海對峙應該是現代意義上地域因素第一次面目清晰的表現。饒有意義的變化是，地域因素從傳統的南與北的文化區域概念，轉向北京與上海這兩個中心城市，並用這兩個城市來命名兩種文學類型。這種變化的內在文化邏輯，似乎至今都沒有被文學史研究者有效地突現出來。在一些人眼中，這種命名，僅僅是文人之間的意氣用事，卻很少有人深究何以文人之間的個性差異要用南北兩個不同的城市來歸類。北京是故都，二千多年中國文學史，北京有過風光和

---

\* 作者現任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輝煌。上海卻是東海邊上的一個小漁村，談不上顯赫的歷史。像文論史上赫赫有名的陸機（261-303），籍貫頭銜是雲間詩人，而不是上海詩人。上海只有到了近代才異軍突起，有了文學史上的自成一體的海派話語權。所以，京海之爭所突顯的不是北京在文化符碼化過程中的持續效應，而是上海作為一個新崛起的現代城市對於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的影響力。或許是因為年輕，上海作為新崛起的文學空間儘管花樣迭出，新招不絕，但也難免長短失衡，爭議不斷。譬如新文學家對於傳統文人的挑戰和排斥，相互之間的水火不相容，讓後來的研究者覺得奇怪。新文學家不是說要造就更自由、更闊大的文學空間嗎，怎麼連一點點不同意見都不能接受，非得斬盡殺絕而後快？新文學家總是說新文學運動起來不容易，受到各種勢力的打壓，那麼輪到新文學家自己主宰文壇世界時，上海的文學局面真的比以往更開放，更自由？這當然是後話，但卻值得玩味。此次刊發的兩篇論文，分別來自上海學者朱軍和香港學者陳國球。他們的專業興趣是中國現代文學。區別在於朱軍年輕，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從外地來滬求學，置身繁華的大上海，對物質的壓抑有著最為深切的感受；陳國球先生是資深學者，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與諸方學人有密切交往，見多而識廣，探討問題的視野開闊平正，心態自然比朱軍要從容。

朱軍先生的論文〈都市空間與現代激進人文地理的演進——以亭子間文人為中心〉探討的問題是上世紀二〇、三〇年代上海的「亭子間」作家，是如何由文壇邊緣人而逐漸成為文壇的領袖人物。的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多重要的作家都與上海有關，但與上海地緣文化淵源關係最為密切的，是二〇年代中後期開始至三〇年代崛起於文壇的一批年輕後生，這包括像文學史上後期「創造社」、「太陽社」等一幫年輕人。這些人的身分特徵極其複雜，遠遠超出了德國學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所描繪的都市浪子、底層邊緣人這樣的都市文化組合。當這些文壇的邊緣人初來上海討生活時，幾乎

都棲身於「亭子間」。這裡的「亭子間」，可以視作是一種特殊身分的象徵，而不僅僅是一個居住的空間。但「亭子間」的確又是上海建築的特有產物，包括當時的年輕作家丁玲（1904-1986）、蔣光慈（1901-1931）等，在自己的文章中都記錄下「亭子間」生活的特殊感受，這與稍後在上海生活的張愛玲（1920-1995）所寫的《上海公寓生活記趣》中所展示的另一個空間——公寓，是完全不同的身分象徵。有意思的是，「亭子間」是都市生活中一個邊緣的生活空間，卻還不是最底層的空間，上海最底層的空間應該是「滾地龍」，一種棚戶建築，那裡居住著很多從蘇北農村來上海討生活的難民。「亭子間」與「公寓」和「滾地龍」形成對照。「亭子間」空間緊鄰著「公寓」，是「公寓」世界最不起眼的一角，但很少有人想到，正是這最不起眼的一角，構成了二〇、三〇年代上海城市空間最富生氣的地方，「亭子間」因此而成爲一種有身分特徵意義的文化象徵。我們不妨以當時中國最大的民營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爲例，領會「亭子間」空間的文化意義。商務印書館的體制由三部分構成，一是編譯所，二是印刷廠，三是總務處。編譯所成員是一些年輕的編輯人員，如鄭振鐸（1898-1958）、茅盾（沈雁冰，1896-1981）、葉聖陶（1894-1988）、楊賢江（1895-1931）等；印刷廠成員大都是蘇北來上海謀生的難民；總務處集中了商務印書館的管理人員，有夏瑞芳（1871-1914）、高鳳池（1864-1950）等商務印書館高管。商務印書館因爲業績出眾，在職人員的待遇一直是上海同行業中最好的。但在二〇、三〇年代勞資衝突中，商務印書館資方感到最不可思議的是，編譯所那些平時資方給予待遇最好的年輕編輯，態度最爲激烈，如中堅分子鄭振鐸，還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1870-1936）的女婿，他作爲資方的對立面，對商務印書館資方代表毫不客氣。如果要將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這一批年輕編輯的身分特徵加以概括的話，「亭子間」文人的身分特徵應該說是比較明顯的。他們有知識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他們的個人背景不同，但大都來自上海之外，因爲機緣關

係，來到上海，他們有職業，但社會生活狀態基本上還是浮游於「亭子間」。與那些最底層的「滾地龍」空間中的難民不同，「亭子間」文人不會僅僅滿足於生存條件的改善與提高，他們還有一套自己的價值理想與政治抱負。這樣的一群人聚集在「亭子間」，經常討論各種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見解。隨著時光的推移和社會政治氣候的變化，「亭子間」空間中孕育的各種思想和主張，通過傳媒管道，擴散到更廣闊的社會空間。商務印書館擁有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文化雜誌《東方雜誌》和小說雜誌《小說月報》等，在塑造二十世紀二〇、三〇年代中國現代文化空間中，擔當重要角色。而執掌其主編之職的文化人，正是一批出入於「亭子間」空間的青年文人。如果說，地域因素在傳統的人文世界，是一種力量的凝聚與釋放的自然因素的話，在現代社會中，因為現代社會因素的加入，而使得地域因素變得超乎異常地活躍，而成爲人文世界中謀求革命的一種激進力量。在我的理解中，激進人文地理與上海都市社會中的「亭子間」空間的聯繫，或許是在這一意義上展開的。激進不僅僅意味著變化，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能量的集聚與釋放。與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變革模式相比較，孕育於上海一地的中國近現代社會和文化力量，是一種現代類型的。就像是一種原子核裂變，在上海這一城市空間中，具備輻射中國各地的驚人力量。原來那些游離於文壇邊緣的小人物，因為匯聚到城市並恰逢這種現代力量的生成時機而變成了一個個能量十足的文化巨人。於是，邊緣人變成了領袖人物。將城市機制與這種文化激變力量聯繫起來考慮，並聚焦於「亭子間」空間，這樣的研究視野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雖不是第一次浮現，卻也別開生面。

陳國球先生的論文〈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描述了二十世紀五〇年代至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文學空間與臺灣的互動關係。我覺得，這篇論文的聚焦重點與其說是香港和臺灣，還不如說是在香港和臺北這兩座城市。它表達了一位立足於城市文化基點的研究者對於城市文化歷史變遷的種種敏感和特殊體驗。如何來描述香港文學，

對於臺灣和中國大陸的研究者而言，都顯得有點尷尬。因為不熟悉或疏於記錄，要梳理出香港文學的歷史脈絡，真是不太容易。就如一部中國歷史不知從何說起一樣，一部香港文學史有時也不知從何說起。陳國球先生藉助臺北的眼光來細細打量香港文學。那麼，陳國球先生何以不從中華民國時代說起呢？其實陳先生是有一副中華民國的眼鏡。他引用了1927年魯迅（1881-1936）3篇談香港的文章，以及臺灣學者胡耐安（1899-1977）、尉天驄談香港文學的言論。這些論者眼中，香港基本上是文化沙漠。所以，在國府東遷之前，論及香港文學，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基本觀點一致，以致於很長時間，大陸與臺灣還是延續著以前的觀點。稍稍不同的是1949年中國政治版圖變動之後，香港的地位變得特殊起來。在兩岸壁壘森嚴，各自為牢的時期，香港文學卻在這種隔絕之中，生產出屬於自己的文學樣式。如果說，大陸這一時期無法遠眺香港，文化上談不上雙方互動，那麼，臺灣與香港之間卻可以遠眺與就近活動。臺北與香港這兩座城市在文化上有了一種鏡像般的互相觀照與認同的可能。在臺北的一些詩人眼中，香港文學最值得關注的是現代主義思潮。從環境、氛圍，或是文學寫作角度來考慮，香港是這一時期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最適合生長的地方。看遍五〇年代的兩岸三地，有哪個地方可以像香港那樣提供適宜於現代主義文學生長的氣候呢？現代主義本來就是一種城市文化。就像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 1921-1988）喜歡將現代主義與城市生活聯繫在一起考察一樣。考察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中國的現代主義思潮，香港可以說是最典型的空間。也正是這樣的原因，陳國球先生藉臺北的視野，觀察香港文學的現代主義特徵，或者說，他是藉臺北的紀弦（1913-2013）等人的眼睛，看到了香港文學想要表達的城市經驗。當然，如果要追溯紀弦的現代主義實驗，我們還可以聯想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上海，但五〇年代的紀弦，設身處地為他考慮，無論如何他是不會願意通過遙看上海來抒發現代主義的詩意，此時此刻他只有通過評說香港文學，才有可能寄託他

的現代主義詩學理想。紀弦眼中的香港，猶如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眼中的倫敦，充滿著「荒原」景色。而香港本地詩人馬朗等人，或許不一定有紀弦等人那麼意識自覺地宣導現代主義詩學。馬朗因為生活在香港，商業城市的壓抑遠遠超過意識形態的壓抑，所以，現代性的壓抑在他身上是商業社會的壓抑，一旦提筆寫作，那種都市壓抑感受就會自動地緩緩流出。而七〇年代，也斯（1949-2013）等新一代香港作家強化了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在也斯這一代香港作家身上，文化意識更加強烈和迫切。因為他們面對著回歸的壓力，對香港文學的認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直接和強烈。記得2005年，我曾在波士頓聽也斯先生談香港文學。他對於香港的愛，他身上所流露出來的香港文學本位論的堅定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的記憶中，現代主義在他的表述中應該是一種現實主義。他喜歡用「現實」這兩個字。譬如說，分析一位香港作家的現代主義傾向，他會說，香港的現實就是這樣，或者是，這樣的現實造就了香港作家的現代主義美學品格。對他而言，現代主義之於香港文學，不是一種外來的文學移植，而是某種召喚而至的幽靈。這是香港文學中最值得關注的文學精神。陳國球先生在論文中指出，1997年回歸前後，香港文學的變異與波動，其實是一種文學精神面臨可能遭遇的困境的憂思與想像。他藉助臺灣的《幼獅文學》與《聯合文學》對香港文學的評價，將什麼是香港文學的問題再一次推到公眾面前。在冷戰結束之後，照理是對峙變坦途，但兩岸三地的文學格局反倒是變得嚴峻起來。香港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問題在臺北的文人眼中已經不再是文化沙漠，而是需要將以現代主義為基準的香港文學確認和確立起來。反觀這一時期的整個中國文學版圖，原來的京海衝突延續到二十世紀末，此時變成了京海台港之爭，這一文學格局或許是未來中國文學史研究需要認真處理的一個學術話題。

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梳理，從最初的京派、海派兩分天下，到今天的香港、臺北的加入，空間在擴大，陌生的成份也在增加。我

們感覺到與我們以往記憶中的文學史知識有某種差異。這種差異是因爲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在調整、變化。以往研究中，研究者總是願意捕捉那些知名度最高的現代作家作品，而後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學變化情況。但現在越來越趨向於將原有的評價暫時加以擱置，從文學生成的特殊空間和人文地理環境著眼，發掘包括城市在內的文化空間，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塑造作用。城市空間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以往的文學史研究中，卻是很少加以展開。大陸學者中，吳福輝教授的新作《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北京大學版，2010年）是第一個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與上海城市生活聯繫在一起論述的，這種變化多多少少也是當今城市化進程讓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生活中感受到城市的重要性。縱觀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作家、詩人，其創作的根本關注點是鄉土。論及鄉土的文學審美經驗，我們的研究者有說不完的話。但一旦視線轉到城市，尤其是現代都市，不僅作家、詩人沒有什麼好話，研究者也少有論及。這種現象體現出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資源對於創作者和研究者思想的某種約束。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兩岸三地現代化趨勢越演愈烈，城市作爲現代生活的核心區域，它在文學、文化上的輻射作用，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因此，城市懷舊之風在兩岸三地很多人的心目中迴盪。懷舊是與城市記憶相關聯的一種情緒。對於上海的城市生活記憶，對於香港城市生活的文學記憶，這都是我們今天想像歷史的一種人文資源。當然，創作和研究中所遇到的問題遠遠要比我這裡所論述到的複雜和豐富。也正是這樣的原因，我願意推薦本欄目的這兩篇文章，他們分別選擇上海、香港作爲文學史研究的聚焦對象，希望從中有一些新的發現。這樣的用心和努力，我是極爲讚賞的。

楊 揚

2013年11月13日於上海寓所